

疫情下的民間信仰變遷與適應 (論壇發言稿)

臺灣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常與非常——疫情下的民俗研究
會 2022-6-18 to 19 (於台中中山醫學大學)

丁仁傑 (未出版，引用請註明出處)

一、前言

疫情底下創造出一種獨特社會關係的邏輯，那這個跟民間信仰的邏輯是不一樣的。這兩個之間，對民間信仰來講，它也是一個轉機，它要怎麼去調適，但是這是一種矛盾、有衝突。那台灣民間信仰因為這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它有一些特質，然後在這一段時間適應的時候，它怎麼樣去適應它，我有一些觀察的面向。

疫情的邏輯很簡單，就是說，你要維持一個身體上的距離，而這是一種愛的表現，那這跟民間信仰是完全不同。我們看那個聖經裡面約翰福音二十章，就講到說，當時耶穌復活的時候，馬利亞去看他，就看不到他的屍體，想：「哎呀他在哪裡？」，就這時候有一個人在那邊，馬利亞以為是園丁，就問他：「耶穌的屍體到哪裡去了？」，結果耶穌回頭（馬利亞是不太認識他了，耶穌已經復活了），馬利亞一看到「啊這就是耶穌」，那馬利亞說「拉波尼！」，就「夫子，你在這裡啊！」。這是很微妙，耶穌說：「不要摸我，我還沒有去見我的父，我還沒有去見耶和華，你不要摸我，你到那些信徒那邊去，跟他說我復活了但我要去見我的父」，然後「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所以耶穌叫她「不要摸我」，然後這什麼意思呢？如果以無神論的角度來看的話，他就是一種用愛的靈性，就「不要碰我」（以上聖經情節的引用，出自於 Zizek 專書 "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另外一種說法，放在一般解經的脈絡哩，耶穌的意思也可能是說：「你現在先不要抱我，我還有要事要做。」。但總之，不接觸本身，可能具有一種更深刻的靈性的交流，也是為了更高的目的，而所產生的行動上的新導向。

事實上，這就發展出一個不超過人們的接觸去彰顯那個愛，而是說：與他人隔絕不碰觸他，維持適當身體的距離，由內在去親近他們，由他人的眼神中，用親密的姿態來開放我們。這是災難中一個靈性的接近，創造一種內在的靈性，創造一種集體性的連結。這東西、內在性的東西，我們現在讀到聖經看

到有這樣精神資源，這個部份就是民間信仰最缺少的東西，就是說，它的信仰是在一種集體活動、集體創造地方的自主權、地方的主權意識，越多人越去創造的民間信仰的邏輯，創造一個 **spectacle**，就是我們人供養、敬拜神，神回饋、保護人，群眾的數量越多，就表示神的力量越大，而且就創造更奇觀的畫面。它不是用內心的虔誠去創造神的力量，雖然那個虔誠是很重要，尤其你看媽祖的信仰，神格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那個內在性虔誠是很重要。

可是呢，這個民間信仰的神是一個有地域性範圍的，所以西港有西港的千歲爺，然後新港有新港的媽祖廟，它的祭祀圈、信仰圈可以擴大，可是它終究有個地域性的範圍，所以神是屬於這地域性的範圍裡面去展現祂的靈驗性，透過人去展現祂的靈驗性。那這跟剛剛前面講的那個「你不要碰我！」——用愛的靈性去面對的那種內在性，其實是不一樣的，所以一開始就是矛盾的，這第一個矛盾，就是內在性跟外在的靈驗展現的矛盾。

二、民間信仰的邏輯：具有空間意義上的 **Spectacle and Power**，開始面臨維度的改變

第二個矛盾我等一下要講的就是說，過去民間信仰的邏輯，它對瘟疫是有辦法的，瘟疫，**epidemic**，我想，昨天早上李豐楙也講過就是說，傳統是有這個東西的，還有對治它，就是一種流行性的急性傳染病。然後呢，對治什麼樣的方式呢？在漢人邏輯就是一種天然感應的原理，用儀式去感應天。然後這創造兩個原則，一個是儀式讓這個地方重新潔淨，一個是你要懺悔，你是不是要受苦受難去道德化你的身體，懺悔然後讓老天爺取消對你的處罰，那有這樣對治性。

可是呢，我們看過去，這個流行病有不同層次，我們看英文就叫 **endemic**，就是一個村落一個地方有一些流行病，可是沒有傳出去；另外一個叫大流行，**epidemic**，就是一個很大地區的流行、比較大的瘟疫。但是這一次叫 **pandemic**，就是全球性的大流行，這個是民間信仰的邏輯沒有辦法去照顧到的。

Endemic (地方流行) 

Epidemic (大流行) 

Pandemic (全球大流行)

我們過去看災難的處理，過去村落的層次，以我過去做的西港保安村來講，假設一個村落有不正常的死亡，很多人死亡，那它怎麼辦呢？它就做兩件事情，一個就是過平安橋，把每個人生辰八字交出去，由法師去幫你做，然後你過了平安橋之後，那個橋下有個制煞的能力，用七星的力量來克制煞氣，法師帶信徒過橋，每一個人過橋等於就通過那個災難，透過制解，用替身來幫你化解災難。那是每一個人要去處理。然後還有地方，每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如果有災難、有人不正常死亡，表示神明的靈力沒有辦法發揮，所以用煮油的儀式、過油的儀式，讓所有包括祖先牌位、神明牌位在的地方，都要去做過油，等於是讓那個地方的神明重新發揮潔淨的功能去保護你。這是 **endemic**。

那到了全區域，像西港刈香，這已是一種針對 **epidemic** 而產生的行動範疇，是針對比單一社區規模與範圍還要大的，出於對疾病的大流行而施行的舉措。這個大流行的針對性，必須要去請千歲爺來處理。千歲爺是一個降災之神，那祂為什麼降災在這裡呢？就顯然這個災難是「天數」，可能你要對千歲爺無盡的照顧周到、去照顧祂，然後讓祂來除災，所以祂是降災也是除災。

然後你這個大範圍的地方會發生災難，這就是出於一個災難的「天數」。然後人們為了驅除這個災難，會想像出這樣一個千歲爺的力量，去創造一個非常高的超越性。那這表示你這地方可能是有一個問題要去處理。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就是說，它已經到了一個全球性，**pandemic**，這個跟過去的災難——只有我們這地方有災難，然後上面有個降災之神，然後我們要去拜祂然後去除掉祂，這樣一個 **epidemic** 的層次——它超越那個層次了，這個是過去比較難想像的，所以我們只能用過去的方法去繼續面對這個 **pandemic**，可是 **pandemic**，「pan」是無所不在的，一個無所不在的東西、一個全球大流行，碰到整個人類沒有辦法去免疫的一個新興傳染病，同一個時間以超乎預期之外的速度跟尺度去流行。

就這種全球大流行，民間信仰過去不知道怎麼去面對它，就是它所面對一個完全不可能的情況，讓我們的日常生活、整個世界停擺，國家陸續地封鎖，然後

我們被限制在自己的公寓裡面，面對不確定的未來，然後不知道怎麼度過這個經濟大危機、這個挑戰，所以我們過去不可能去應對它，我們現在要實現過去既有的穩定的座標來講，幾乎是不可能。雖然民間信仰可以想像，用 **endemic** 或 **epidemic** 不斷做瘟疫法會啊去做這樣的事情，我也問過朱堃燦道長說：「那你做這個瘟疫法會，到底瘟疫會走嗎？」，他說：「佛度有緣人」，就是說，我幫你做這個法會沒有錯，你心善的人、做好事的人你就可以驅逐這個瘟疫。可是不是，他並沒有辦法面對這整個「**pandemic**」去處理，他只能說對你個人，可能你道德上修養，然後你參加這個法會，然後「佛度有緣人」可以讓你去那個…。

那過去兩個問題，一個說我們過去的民間信仰是固定的、地域的防禦，那不曾想像現在有一個超越全球這樣一個東西，怎麼樣去想像它？民間信仰有沒有什麼籌碼，去跟全球公衛體系或國家公衛體系對話或者對抗？國家公衛體系說「你全部要隔絕」的時候，你拿不出論述來去跟它講說「疾病的造成有個道德上的原因是全球性的」，你只能說「我這地方性的」，可是到全球性怎麼去講？民間信仰要發展這樣的論述。然後呢，民間信仰要發展一個內在的靈性的論述，它除了外在的防禦以外，人跟人通通隔絕的時候，這個民間信仰本來是個社區性質，變成神跟人的性質的時候，民間信仰要去發展那個論述。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當這個 **epidemic** 到 **pandemic** 的時候，全球公衛體系跟國家公衛體系都介入的時候，民間信仰地方上的相對自主性被完全控制了，那這個東西你怎麼去面對它？你的自主性完全被控制的時候。但這有階段性，我也看到溫宗翰講的就是說，其實分兩個階段，之前是疫情要隔絕、防堵，最後沒辦法防堵，就是完全用日常生活作息的一部分，溫宗翰叫「後疫情時代」，這個時候大概 2021 年一月以後就是後疫情時代，這樣的情況，必須要接受疫情成為日常生活裡面重要的一部分。

三、現代多元國家與底層民眾交互動員下的矛盾與弔詭

那下面有時間我再講，就是在這幾個部份看到一個民間信仰在危機裡面的轉變，還有幾個觀察的面向，那到底這種轉變有多大程度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有多大程度是因為外在力量而暫時形式上的改變？那我很多資料也是根據洪瑩發、蔡武晃跟溫宗翰的一些田野報導。第一個要講的，剛講的就是一個維度的改變：**endemic** 到 **epidemic** 到 **pandemic** 一個疾病維度的改變。第二個改變就是說，現在的多元國家底下，跟底層民眾的交互動員底下的矛盾與弔詭。那這尤其由大甲鎮瀾宮要不要進行進香活動的那個矛盾，看得特別出來，因為民間要動員地方的

底層民眾去選舉的考慮。

可是呢，可是那之間不是我截然的就可以禁止你，廣義來講，出於選舉的考慮，現在的多元國家，公衛是一個很大的框架沒有錯，可是這界線是浮動的，有時候甚至是模糊的。那鎮瀾宮它自己又不屬於民進黨，所以要特別小心，不能得罪當政者。然後剛好前陣子那個民進黨因為滅香事件，也害怕激怒民眾，所以很希望有地方政治人物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所以雙方都是很小心。所以看得出來當時政府要停止你要互相的協商，有很大博弈的那種情況。然後呢，民間信仰當你禁止它的時候，也看得出來當時那個白沙屯跟大甲鎮瀾宮都不能進香，可是白沙屯搶先就宣佈。民間信仰要對民眾交待，它也要找台階下，那當時白沙屯的拱天宮就馬上宣佈，它當時遶境、進香要停止的時候，它直接就宣示講了一句話：「信仰與疫情孰輕孰重，傳統與科學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達到符合社會觀感的期待，又不違反傳統信仰文化，著實考驗著主事者的智慧與判斷」，就是說，它已經跟傳統的威權國家不太一樣，國家跟底層民眾的交互動員下，有很多矛盾的情況。

四、後段班進入前段班的心理糾結

再來就是說，民間信仰以前後段班，基督教可能前段班，而現在後段班進入前段班，它的心裡糾結，以前寺廟監督條例是排擠地方的民俗，就是進入當代民主國家，它地方動員的基石是民間信仰，可是它又要承擔公共的責任，所以它角色有重大的改變。所以這裡面就很矛盾，它馬上就會成為箭靶，說「你為什麼要辦這大型的活動」什麼的，然後呢，民間信仰自己也很害怕，其實它已經進入前段班了，它有更多的立場去幫自己講，可是它心裡面還是以寺廟監督條例那個框架在自我定位，所以它這裡面有一個很糾結的心裡，這也是從疫情面看得很清楚。

五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intersubjectivity（由大民間信仰到小民間信仰）

我們剛剛講，過去民間信仰是一個地方性自主權的、地方主權的保護，這個保護就是有地區性的、集體性的，那你一旦不能遶境，不准去進行集體性的展演，那整個地方就沒辦法擴張，所以它就由一個大的民間信仰，轉到小的民間信仰。我們看到這次很多廟就改成遶境活動簡化了，可是它會送各種小紀念品給信徒，送信徒平安水啊、送信徒口罩啊，然後驅瘟保平安的符咒啊等等。所以這也是一個契機，就是說民間信仰由一個一定要集體性動員的方式，轉到一個就像我們剛

剛一開始講到那個聖經裡面的話：「你不要碰我」，就是用愛的靈性跟他人接觸，我們與他人隔絕不碰觸他人，維持適當身體的距離，用內在性去親近他人，由他人的眼神跟親密的姿態來開放我們，創造一種災難中靈性的接近。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民間信仰能不能創造這樣的東西？它現在已經有一個我們叫做「intersubjectivity」，就是人際的形式，去彰顯那個人跟信徒的關係，由各種物質化的條件、物質化的基礎去彰顯它，可是呢，它是不是能夠從那個 popular sovereignty，那個地方主權的形式，轉移到這個由這個各種地方性的交互主體的形式去出現？就是說這裡面，將來會怎麼發展，是不是一個契機讓民間信仰去開展這個比較內在、靈性的、人跟人接觸的、人跟人關心的這個部份，而不只是一個 spectacle，去彰顯那個廟會形式的部份，而是另外一部份，人跟人那種內在的接觸部份，這一次有些線索能不能繼續下去，會怎麼樣…。

六、文明身體化的公民與傳統儀式象徵身體化的公眾的交織

那再來就是說，身體。我們經過 SARS 之後，大家都會戴口罩，有一個文明化的身體、公民在那邊，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像剛剛王郁茗老師講的，我們的身體更多是在民間知識、民間文化、民俗的慣習裡面。那這兩個東西是有矛盾的，在都市裡面可能看到那個公衛體系、現代市民——更強化的現代公衛市民。

可是鄉下，在傳統儀式下的信徒，他是一個身體化還是在傳統信仰裡面的時候，這個東西對居住在鄉村來講相當矛盾，如果你不讓他進入那個民間信仰集體互動的場域裡面，他雖然表面上怕媒體注視，他會配合公衛去做很多現代公衛體系下的市民會做的事情，可是這東西就是很表面的形式，只要沒有外在壓力的情況之下，他並不會被規訓。所以公衛體系的規訓化確實會發生一個作用，但是它並沒有太持久的效果，所以兩個力量在拉扯。那都市化跟鄉村就是差異很大，兩種力量在市民、鄉民的身上拉扯。

七、新常態化的民間信仰：媒介環境的重塑與重構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我們知道媒體，這些大廟經營網路很久了，他們的 GPS 啊、隨時追蹤廟的行進的管道啊、開放直播，都一直有。但是過去是參與者不多，只有少數的人會參與。但是這一次呢，它整個常態化的民間信仰，完全用媒介的

環境去經營，變成說媒介的環境在重塑跟重構整個民間信仰。所以，現在就是整個媒介就變得很重要，就是變得常態化了，民間信仰跟媒介的扣連變得常態化。

但是這裡面有個問題就是說，當用媒介、用直播的方式的時候，會影響它內部權力的結構。如果那個直播一直照著主委，或是一直照著某個政治人物，那就創造一個塑造明星的效果，所以人的權力會適當地重新分配。所以這新的常態化的民間信仰會讓已經行之已久的媒介環境跟民間信仰的媒介化，可能影響會更深遠。但這個不知道，如果說現在疫情就鬆了，可能又回復，可是如果疫情更長更長，它就會完全常態化，那內部的權力結構、內部的人物的社會關係，可能會相當的改變。很多本來是一個公共政治權力展演的舞台，這部份很多東西沒辦法操作。

八、Vicarious Participation 的大行其道：道教的發展契機

那最後一點，我想提的就是說，這次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因為 2003 年那時候 SARS 疫情大概只有三四個月就結束了，然後北部當時有朱堃燦在萬華地區做驅瘟法會，當然借廣成儀制還有南部的一些科儀去做。北部本來沒有這種送王船、驅瘟的東西，可是因為有這東西，當時有做過這樣的東西。那這一次呢，從南到北，大量的這種驅瘟法會都被運用，我叫做「vicarious participation」，就是一個社區為了創造它的超越性，它會有一部份道教的科儀，讓道士去幫社區創造它的超越性，那村民不太管他怎麼做，就是請他們來，然後他們跟先天的神明，三清道祖的神明做一個連結，然後創造地方的超越性。那這一次呢，整個道教也跟上，因為時間很長，所以道教有這個機會去研發，把各種驅瘟法會放在這個型態裡面。

所以這次我叫 vicarious participation，大型祈道，這是一個道教發展的契機，然後儀式專家的展演達成了一種相當大的效果。那當然蔡武晃也經過統計分析，是不是道士做完驅瘟法會以後，疫情就有下降呢？——沒有直接相關。所以就是一個儀式上的展演。那因為這個疫情拉得很長，道士紛紛跟上這個市場需求，而且不是佛教喔，是道教，在這方面它有相當地方性的彈性，能夠去適應這個新情境的變化。

九、代結語

這些都是這次疫情我想提到的幾個主要面向的變化。它某種程度是改變了民間信仰的東西，某種程度來講，民間信仰也在調整，但是民間信仰本身有些內在的困難，它是沒有辦法，是不是能跟上，發展出內在信仰的那種…像基督教那樣一個信仰邏輯？不知道。但它這方面的論述還是需要民間信仰本身去調整。我想就我社會學家的觀察，大概提到這幾點。